

生产力标准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李景源

生产力标准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在邓小平带领全党拨乱反正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标准起到了总的方法论作用。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生产力分析方法”。邓小平并未对生产力标准在其理论中的地位作过评价，但我们从他与实践标准的评价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因为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生产力标准如一根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之中；只有抓住这条主线，才能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实质，才能准确地把握邓小平对事关国家命运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作出重大决策的基本思路和思想轨迹。

一、生产力标准是实现工作中心转移的理论武器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个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邓小平根据生产力原理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后来又概括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生产力标准是唯物史观的精髓，也是我们党在政治路线上拨乱反正、实现工作中心转移的思想武器。

众所周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之一，其经典表达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出的，核心思想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本人提出的生产力标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科学原理是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说明该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产生、发展和变革的根本依据。马克思依据这一根本原理，考察了阶级的产生与消亡同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关系，最终证明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7页）。这就从根本上厘清了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同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事实证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政党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1921年初，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以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运用唯物史观的光辉典范。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十分重视历史观及其方法论的研究。他对唯物史观的贡献是：第一，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方法论。他回忆说，1920年，他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就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为唯物史观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第二，毛泽东明确地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44年3月，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说：“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主要是讲的这件事，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9页）第三，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毛泽东关于唯物史观的这些精辟见解，为他的后继者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原理当作“唯生产力论”来批判，把邓小平关于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号召看作是“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用阶级斗争压制经济建设，把党的政治路线完全搞乱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要实现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最大的理论难题就是如何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关系。针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的思想顾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他强调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他在另一处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同上，第116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在邓小平看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一个对“政治”概念的重新理解问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成为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造成了政治运动为中心的不正常状态，使党的工作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越来越远。很显然，要实现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就必须赋予“政治”这个概念以新的时代内容。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马克思和列宁都作出过“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论断；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曾经说过“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的看法。这些观点突出了革命时期“政治”概念的主要内容，是十分正确的。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

法六十条》中，谈到了政治内容变化的规律问题。他说：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有的，但是内容变了；在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上述看法。邓小平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的内容也不同，但不管内容如何变化，政治总是同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相关。从革命时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政治路线的核心内容，标志着我们党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也是邓小平在新时期政治观的主要特色。制定新的政治路线，就是提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目标。邓小平说，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政治路线“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同上，第276页）他还认为，离开发展生产力，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所以，邓小平也把生产力标准称作衡量一切工作的主要政治标准。这样，邓小平通过对“政治”概念内涵的转换，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有机统一，为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生产力标准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哲学基础

邓小平理论是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他看来，思想理论建设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理论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真地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其症结就在于未能从理论上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道路问题。

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道路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普遍碰到的一个新问题，并非一国独有的难题。二战之后，亚非拉地区涌现出一批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既想往社会主义，又不完全理解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晚年(1974年)曾经给国内学者出过题目，让他们研究为什么非洲的社会主义搞不起来。1980年4、5月间，邓小平会见几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在介绍中国的经验和教训时，两次提到生产力标准。一次是他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谈话时讲的，他说：“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同上，第312页）另一次是他同几内亚总统杜尔谈话时讲的，他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同上，第314页）这几次谈话表明，邓小平自觉地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思考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并着手解决中国的改革开放所遭遇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即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的改革、生产力的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历史观要回答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个动力又是有结构和层次的。搞清楚革命、改革、发展生产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构，正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

1980年初，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在谈到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发展动力问题时，提出了阶级革命和发展生产力(即生产力革命)的关系问题。他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与此同时，他多次讲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三种革命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涉及到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是他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理念，因而也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光辉运用与发展。

首先，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指出，革命具有多种形式，除了阶级革命和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对传统体制的重大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阶级“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同上，第146页），对人类历史发展来讲，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因而相对于阶级革命和体制改革而言，是最根本的革命。这一论述，对于澄清当时关于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关系的争论具有重大意义。这是邓小平首次从理论上回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问题。

其次，如何理解邓小平用“第二次革命”强调改革?根据邓小平的论述，这个命题包含三层含义。其一，就其重要性上看，改革与阶级革命相类似。改革虽然与阶级革命有区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就其深刻性而言，它也是某种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在谈到改革的意义时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再不改革，社会主义就会被葬送。他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道理也要讲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其二，就其功能上讲，改革与阶级革命相类似。在邓小平看来，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同上，第370页）其三，把解放生产力同发展生产力并提，强调在社会主义阶段，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和必由之路。传统的观念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全面深刻地分析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认为，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他把改革称之为实现宏伟目标的“根本政策”，“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同上，第142页）。在南方谈话中，他对上述思想又作了进一步的表述：“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同上，第370页）

再次，对生产力革命给予了充分的论述，为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党的“八大”正是依据这一原理，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1957年春，毛泽东在南京党的干部会议上讲，现在处在一个变动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同文化革命。后来，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被反右斗争扩大化打断了，技术革命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所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在历史的新时期，邓小平提出“生产力革命”的概念，就是连续党的八大决策和毛泽东的“技术革命”的号召，重新确立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根本动力的地位。1979年，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实现现代化，“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除了把现代化称作一场革命以外，他还在更多的场合下把四个现代化称作最大的政治。这样，长期困扰人们的两大理论问题，即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 系问题，在邓小平的艰辛探索中基本上得到了解决。邓小平在对“三种革命”理论阐述的基础上，在全党确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新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由此为发端，邓小平逐步提出并展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三、生产力标准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保证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坚持好这条基本路线，首先要阐明党的基本路线所包含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即“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生产力标准是贯穿于基本路线的灵魂，是邓小平提出和阐述这条发展路线的立足点，因而也是我们理解和落实这条路线的切入点。

第一，生产力标准是制定和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发点。

首先，生产力标准是政策选择的出发点。正如邓小平多次申明的，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人们重新考虑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决定进行改革，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同上，第134-135页）以什么作为“好的政策”的尺度？就是生产力标准。说到底，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充满活力，才能使社会生产力尽快地发展起来。所谓“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其次，生产力标准也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锐利武器。在改革开放之初，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涉及姓资、姓社的重大理论问题。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邓小平从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计划体制的弊端，多次指出，长期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光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同上，第364页）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区分开来。最根本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同上，第203页）

第二，生产力标准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足点。邓小平多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政治保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其内容之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针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为什么坚持以及怎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识模糊的现实，邓小平作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并对此作出了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述。

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基点放在生产力发展上，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阐明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是全盘西化，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党的领导，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所以，邓小平认为，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会对现代化建设造成不可忽视的冲击。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不行。“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9页）所以，搞好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

邓小平在论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曾多次提出，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当代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其问题并不是出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出在“怎样坚持”上，出在他们不顾历史条件的差异照搬并囿于马克思的某些具体结论和设想，而背离了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和精神实质。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是个科学体系的观点出发，把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别开来。他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1页）据此，邓小平提出“精髓”论、“硬道理”论，目的就是号召人们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容上下功夫。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说，我们深刻地检讨了我们的历史，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要做到四个坚持，还要把坚持和发展结合起来。他在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

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同上，第91页）此外，要搞好四个坚持，主要的是不能离开生产力及其发展的原理抽象地谈论四个坚持，不能把经济建设同四个坚持对立起来，要着眼于为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自觉地把生产力标准作为四个坚持的根本标准：“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同上，第213页）

第三，生产力标准是促进两个基本点相结合的基础。处理好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的关系，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发展路线必须面对的重大基本问题。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同上，第248页）邓小平立足于生产力标准，对两者相互依存的前提和基础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

首先，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两者共生互补的前提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失去这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在讲话中总是讲两个稳定，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他说，“中国的政策基本上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7页）“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同上，第218页）

其次，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互为中介，形成互促共契的整合关系，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服务。在邓小平看来，如果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会被葬送；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保证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如果动摇四个坚持，就会动摇整个现代化事业，就会干扰改革开放政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就是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科学地统一起来，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现代化事业顺利进行以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领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把坚持社会主义的着眼点不是放在抵制资本主义方面，而是着眼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由此可见，生产力标准是邓小平思考和制定中国发展路线的核心，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的两大原则始终是围绕这个核心运行的。把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同生产力标准联系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为什么坚持和怎样坚持这一重要问题。

如上所述，生产力革命和生产力标准两个范畴，是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它们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是邓小平主张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大目标模式，即“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理论主题的最根本的解答。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就要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不动摇。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 《邓小平文选》，1993年、1994年，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82年，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文集》，1996年，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王生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哲学研究》2004年第7期）